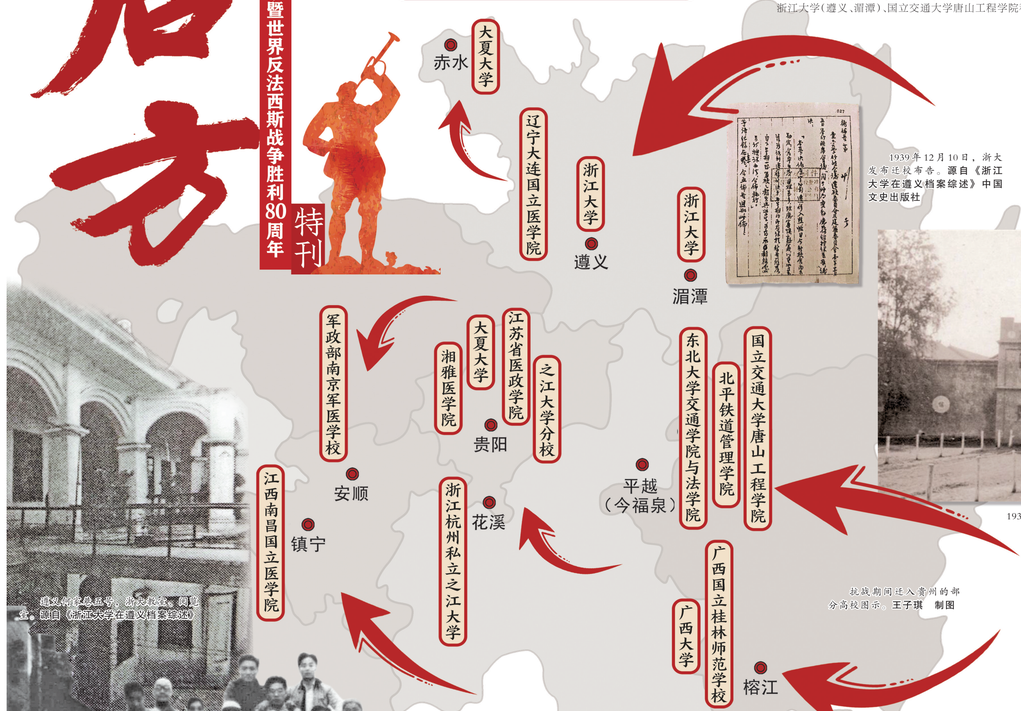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大后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特刊

抗战期间，中国高等学校大迁徙的过程持续到1945年，共有135所国立、省立、私立综合性大学和各类专门学校参与。

这场堪称“空前绝后”的高等学校大迁徙，在保护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命脉的同时，客观上也造就了西南地区若干教科融合的人文重镇和学术高地，形成了壮美的文教抗战景观。



抗战期间迁入贵州的部分高校图示 王子琪 制图

炮火硝烟中安顿的课桌

——抗战高校西迁保存教育国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蔚

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20来所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为时14年的抗日战争中，贵州作为战略大后方，为大批迁徙院校安顿了一张课桌。

历史学者范同寿在其著述里提到，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2所学校便率先迁到贵州，分别是1931年迁入遵义的辽宁大连国立医学院，1932年迁入平越（今福泉）的东北大学交通学院与法学院。全面抗战爆发后，诸多高校陆续迁入贵州，迁入贵州的高校多达20来所。

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福泉）、大夏大学（贵阳、赤水）、湘雅医学院（贵阳）、军政部南京军医学校（安顺）、江苏省医政学院（贵阳）、之江大学分校（贵阳）、江西南昌国立医学院（镇宁）、浙江杭州私立之江大学（花溪）、广西大学（榕江）、广西国立桂林师范学校（榕江）。此外，还有12所军事院校也曾先后迁入，在贵州放下了一张安静的课桌。

其中，由贵州兴义人王伯群出资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是较早迁到贵州的学校，贵州人民以隐满的热情、博大的胸怀，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教学活动井然有序，还曾于1939年6月1日举办建校15周年校庆活动。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在贵州办学的时间最长。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

不仅大夏大学，西迁高校在贵州均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炮火硝烟中没有停止讲课

2008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名为《文军西征》的电视纪录片，一共10集。该片讲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离开杭州，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桩影响深远、震撼人心的壮举。

辗转6省后，浙江大学师生最终择定山明水秀、民风朴实、文化氛围浓郁的遵、湄地区为战时教学与科研的归宿地。刊载于1941年7月《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会刊》上的朱希侃撰文《八千里路云和月从杭州到黔北》记叙：“我们不得不‘行行重行行’，一搬搬到遵义……由邮局旧址到何家巷，足足有一里多路。一下课，这条路上全是挟着笔记的同学来往流。”

李政道回忆，在湄潭就读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设在两个会馆里。李政道白天会到茶馆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周围再喧闹都是看书刷题一坐一天。

西迁贵州了年的浙江大学，涌现出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大批科学名士，获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

浙大学者的风雅也留在了湄潭。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数学家的苏步青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创办湄江吟社，品茗赋诗笑谈浮沉，湄江吟社共创作200多首诗作。苏步青晚年时，家中书房挂满他自己的诗词，其中2幅就是他在湄潭写的《试新茶》，小城始终是他的牵挂。

贵阳有个地名和抗战高校迁徙有关——湘雅村，得名源于湘雅医学院的迁驻。1938年10月，私立湘雅医学院由湖南长沙迁到贵阳，先租民房复课，后迁至省城以西新校舍上课，并以迁至贵阳的国民政府中央医院作为实习基地。该院校舍所在地，即因此以湘雅村得名，一直沿用至今。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谢廷秋著有专著研究抗战高校西迁，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在炮火硝烟中没有停止招生、没有停止讲课，得益于地方和校方都在守护这些高等教育，地方和民众无条件接纳这些高校，保存了中国的文脉，是对日抗战的一部文教史诗。

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也是在战势告急后内迁，师生经广西桂林、柳州，徒步2000余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终于1939年2月中旬到达贵州平越（今福泉市），师生加上职工家属仓院近1000人，其中就有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

“从1939年春到1944年冬，唐山交大迁驻平越达6年之久。唐山交大迁到平越后，一无教室，二无宿舍，平越人民特地腾出平越初中所在地孔庙给学院作教室和办公室；让出城厢小学所在地考棚，给学院作学生宿舍，并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木兰斋’；同时动员群众挤出一些住房供教授、职工住宿。接着，又积极协助学院修建了一座简易图书馆，开辟了大小两个操场，千方百计地帮助学院解决办学中的困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的《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记录了这一历程。

共同演绎珠联璧合的办学史

西迁高校保存了教育国脉，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还壮大了西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期间大批内地与沿海院校的迁黔办学，成为中国教育史与贵州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恢宏篇章。范同寿认为，战时院校内迁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这场为了远离战火，将“战时须作平时看”而形成的内迁潮，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摧毁中华民族教育体系的企图，为国家保存了教育国脉，保护和培养了大批各学科、各领域的文化精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院校内迁后的教育科研成果，为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在这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院士、科学家、文艺家都有着抗战内迁经历这一点，即可得到证明。

湄潭是浙大西迁后农学院的所在地，1939年9月，由刘迺芝教授牵头，在湄潭县城南筹建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刘迺芝与张天福、李联标等4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汇聚于湄潭打鼓坡（今象山），联合对当地茶叶种植进行科研开发，成为湄潭茶叶名扬四方、跻身名茶之列的科研基础。

贵州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为内迁院校提供了稳定、宽松、和谐的办学环境；世代居住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山区人民，获得了世代企望的优质教育。

抗战时期大批院校迁入贵州，在崇山峻岭中坚持教学与科研。传承文明、嘉教于民、佑启乡邦，迁黔院校大学在贵州群山间熠熠生辉，并推动抗战期间的贵州新设了贵州医科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医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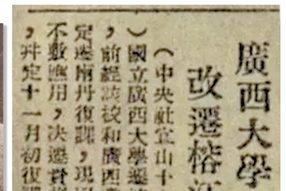
历经烽火岁月，贵州守护西迁高校文教根脉，与西迁高校一起抗日、缔结的深厚情谊至今不渝。2024年，大夏大学创校100周年，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们从世界各地赶赴贵州，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经历过浙大西迁的人始终将湄潭视为第二故乡，每年都有浙大人和他们的后代到湄潭寻脉；广西大学多次组织师生赴榕江寻访旧址……

浙大师生西迁途中。源自图书《永远的大学精神 浙大西迁办学纪实》

1937年11月至1945年1月，大夏大学贵阳讲武堂校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供图

大夏大学赤水迁校纪念碑。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供图

1939年12月10日，浙大发布迁校布告。源自《浙江大学在遵义档案综述》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21日第二版报道《广西大学改迁榕江》。广西大学供图

1939年，为防日机轰炸，国立贵阳医学院租借六广门外空地建设校舍，茅草付墙，又被称为“草棚大学”。

国立湘雅医学院师生在贵阳合影。

大夏大学

开创贵州师范本科教育先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姚曼

1937年7月，大夏大学——这所1924年6月创办于上海，为求教育强国、光大华夏的大学开始了迁校的筹措事宜。远在西南腹地的贵阳成为首选。在欧元怀亿述中，“贵阳的地址决定，事先曾受到不少师生反对，但大夏校长王伯群先生科定故事非短期可以结束。西南大后方将为抗战之砥柱……”作为同盟会元老，大夏大学的创始人、校长王伯群正是贵州兴义人。

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得到长足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贵州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饱满的热情，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

今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是这段西迁历史的深入研究者，他介绍，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1938年，王伯群在《大夏周报》的复刊词中号召全校师生要善于利用贵州“重要之地理环境，发挥我大夏固有师生合作精神，以贵州为研究对象，在学术上有所新发现，贡献诸政府，增强抗战力量。”

自此，新开设的大夏大学为财政部故券总局开设盐务专修班；王伯群创办聚康银行、利民公司、仁和水岸川盐运销处并任董事长；大夏校友赵发智为贵州首次引进烤烟种植与烘烤技术，多方助力西南社会经济建设。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量开展面狭田野调查，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等，这些著作对研究贵州的民族发展史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让外界进一步认识贵州人。大夏大学教授马宗荣、谢六逸主持的贵州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88余种、10余万册各种图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传播、民智启迪，增强民族信心。

1941年，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贵州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花溪校区并入贵州大学，成为今贵州大学东校区的重要基础。王伯群主持筹设的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并入贵阳一中。

1944年11月25日，王伯群与众教职员代表在贵阳市护国路135号召开了第49次校务会议，就当时的抗战形势做出了大夏大学疏散至赤水的决议。1945年春，在赤水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大夏大学以立昌官方校本部，同时借省立赤水中学等部分校舍正式复课，直到1946年迁离。临别前，由中文系教授陈甚铨撰写的《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碑文》，立于赤水校本部，记录下了这段西迁历史。

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1947年，已回迁上海的大夏大学为纪念在贵州办学历史，将校内甫姓河支河改称“赤水河”，同时在河上修建赤水桥和贵阳桥。1951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主要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内重铸大夏大学迁校碑。2023年，赤水市政府向华东师范大学赠送赤水丹霞石，石上题写“赤水桥”。

自2007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先后与贵阳学院、赤水市人民政府等签署对口支援帮扶协议，在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2019年，贵州与华东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教育综合改革、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战略性合作。

2024年大夏大学建校百年之际，贵州与华东师范大学再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在战略决策咨询、科研合作、学科建设、教育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当年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与赤水市政府携手共建的大夏大学历史陈列馆在赤水市文昌宫正式揭幕。双方还合作打造了华东师范大学赤水一中强基实验班。随后5月17日，由贵州省教育厅、贵阳市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贵州百万共建的华东师范大学贵州（大数据应用）研究院揭牌。

从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到数字时代的“山海共赢”，在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贵州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故事里，既有着百年教育基因的延续，更有着面向未来的创新突围。

广西大学

在榕江埋下了一粒足球的种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

7月26日，黔东南的山谷再次被欢呼声点燃，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和巴西传奇球星罗伯托·卡洛斯的身影出现在重启的贵州“村超”绿茵场上，数万名观众欢呼雷动。镜头一次次聚焦榕江，人们不禁探寻：这片土地上为何燃烧着如此炽热的足球热情？

1999年版《榕江县志》记载了这一源起：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迁榕，将足球运动传入榕江。

时间的指针拨回至1944年深秋，日军南侵的铁蹄碾碎了桂北的宁静。为守护教育火种，广西大学师生背起行囊，沿着两广客商踩出的古道，翻越榕江境内的马鞍山。

2018年广西大学90周年校庆晚会上，由广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胡红一执导的情景短剧《不灭的梦想》重现了这段历程：烽烟四起中，师生从桂林出发，先至融县（现柳州融水县），柳州、桂林陷落后，逆柳江赴榕江。水路滩多船滞，山路崎岖艰行，队伍分两路，老弱乘船，其余步行，在山梁沟壑间艰难跋涉。当凯歌交迫的队伍翻过莽莽地，望见山脚下散于如碧玉般都柳江畔的榕江县城，终得安顿。

初抵榕江，师生面临着物资短缺、经费未到的窘境。此时，榕江人以都柳江水般绵长的善意伸出援手：贵州会馆与两湖会馆各捐稻谷百担，商会及私人共捐法币20万元，汉民中学慷慨解囊，合力助师生渡过难关。百姓主动腾出住房，县政府院、学校、会馆等场所也被一一借出，成了延续弦歌的教学之地。

广西大学师生的到来，也为这座小城注入了新的气息。话剧演出、歌咏比赛、壁报画展丰富了百姓精神生活；经济调查、民俗考察促进了当地科学文化进步；榕江县立中正小学里，以女校长黄秉勤为代表的西天毕业生，为小城带来新式教育理念。

而最为榕江百姓所津津乐道，并在这片土地上悄然扎根、蓬勃生长的种子，正是足球。2018年，胡红一前往榕江校庆采风时，采访民族中学教师段盛松，他的祖父段前烈当年在榕江就读于广西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毕业后曾任榕江中学校长。他回忆祖父所说，那时每到周末，古州二小的操场就像过节。广西大学在榕期间，每周都会举行各类球类比赛，还多次举办运动会。那些精彩的足球比赛，赛场上球员们奔跑、传球、射门，场外观众呐喊助威，热闹非凡，为苦闷的战时生活注入了活力。

1945年秋，学生剧团排演的《雷雨》演出至高潮时，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戏台上下瞬间沸腾。师生与百姓举着火把沿街欢庆，火光映红都柳江水面。不久后，广西大学师生踏上归途，只留下磨损的足球门框，和榕江人愈发熟练的带球动作。

“艰难西迁与榕江办学，让家国情怀融入校魂。师生在战火中护校兴学，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相连，形成宽广而坚实的初心的传统。与榕江百姓相遇以来，更孕育出互助担当的精神基因。”胡红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

80年来，两地情谊不断深化。广西大学多次组织师生赴榕江寻访旧址、收集史料，将这段历史搬上校庆舞台，今师生动容；2023年，校友足球协会到访“村超”赛场；2024年暑期，校团委再组团赴榕江开展校史与红色教育，赓续精神血脉……

都柳江的流水记得，马鞍山的清风记得，那粒在惠难与共中埋下的足球的种子与结下的情谊，早已长成枝叶婆娑的参天大树。

湘雅医学院

与贵州高等医科学府守望相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凯 熊江春 实习生 李熙鹏

1938年9月，湘雅医学院教授张孝骞在湖南衡阳望着那批超过80吨，即将运往贵阳的珍贵医学典籍、教学设备，以及准备启程前往贵阳的师生，心中五味杂陈。彼时，长沙屋遭日机轰炸，在此办学已难以为继，刚迁到衡阳一个月的湘雅医学院又要继续西迁贵阳。

1937年底，鉴于抗战时期医疗资源紧缺，为谋战时急切之需、树立西南医学之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李宗恩、杨崇瑞、朱章赓等医学名家临危受命，到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以下简称贵阳医学院），李宗恩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1938年3月1日，贵阳医学院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9所国立医学院之一。同年10月，张孝骞携湘雅医学院师生抵达贵阳，由于一无住所，二无校舍，时任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鼎力相助，将阳明路贵阳医学院教室借其进行课堂教学，由此两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母共济的两校友谊也是两位有志青年并肩抗战“烽火情”的延续。张孝骞与李宗恩同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两人一同共事、共同成长1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愿在沦陷区工作的两人毅然南下抗战救国，张孝骞来到湘雅医学院，是年秋担任代理院长职务，李宗恩则到贵阳筹建国立贵阳医学院。

在抗战期间，两校一直互帮互助、携手同行。1938年1月，贵阳医学院第一届招生简章中，长沙报名地点就设立在湘雅医学院。在同年6月一封由张孝骞写给李宗恩的书信记述，湘雅医学院在贵阳医学院筹备期间赠送了相关书籍，并安排刘合荪等教师前来支教。1941年至1943年，两校联合发布招生简章，共同在贵阳、昆明、重庆、长沙等地设置招生点。

湘雅医学院与贵阳医学院的这段难忘的历史，不仅是两所医学高校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峥嵘岁月，还是众多高校西迁、许多受国人大抗日救国的一个生动缩影。

“我们要从无中创造有，要在荒地上开辟新家园。”对于李宗恩和同事们而言，在抗战中成立的贵阳医学院，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培养完善的医学人才，需要借助各方力量。

为调整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员兼课待遇，1940年7月，李宗恩、张孝骞、朱章赓三人签订了教员兼课待遇办法协议。

中国四大内科专家之一的杨济时教授原来是湘雅医学院的教务长，后来应李宗恩邀请，到贵阳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还担任过学校总务长、内科主任等职，并作为第一届附院主任带头筹建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李瑞林、凌敏酝、梁觉如、白施恩、吴执中、齐祺祖、张德威等湘雅医学院老师来校兼课，有些还担任科主任。贵阳医学院的主事午教授等也到湘雅医学院兼课。他们严谨的教学风格和医学理念与技术为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

“那时，我们学校任教的专家教授还来自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质量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被誉为‘小协和’，不仅开创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也为贵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部长陈颖介绍。

陈颖介绍，在抗战时期，学校的发展虽然历经了风雨坎坷，但学校师生不仅在医学教育与医疗救治上发挥作用，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湘雅医学院于2000年并入中南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医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砥砺前行，现发展成贵州医科大学，构建起“学士—硕士—博士”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如今的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四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拥有我国首个聚焦喀斯特地区民族医药资源开发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累计培养了8万余名医药卫生人才，成为贵州省重要的医学教育基地，拥有5所直属附属医院，构建了全省性的医疗服务网。

浙江大学

在湄潭取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从遵义会议会址向东北行70余公里，便望素有“贵州小江南”之称的湄潭。这座坐落于湄江之滨的小城，四面环山，湄江河与湄水河在城南象山脚下交汇，形成深潭，江流弯环如眉，湄潭也因此得名。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座宁静的黔北小城与浙江大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教育文脉，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怀抱“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之志，踏上了西迁之路。他们辗转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行程2000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因彼时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完全修通，且湄潭校舍需筹备，首批师生暂驻贵阳青岩，校本部随后扎根遵义。自此，浙大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开始了长达7年的办学生涯，直至抗战胜利。

早在浙大决定何去何从和准备西迁继续办学之时，竺可桢就提出，要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竺可桢的这一决策，使浙大这“文军”，在长江以南的赣中、桂北、黔北等地坚持教学和科研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进程。

1940年春浙大迁入湄潭后，当地百姓以质朴的情谊接纳远道而来的浙大师生，曾为县民教育的文庙，成为了浙大分部办公室和图书馆所在地；湄潭的老百姓积极腾房让屋，提供给浙大师生使用；当地粮商刘某曾冒险将百担军粮转赠浙大食堂；永兴士绅也组织挑夫为校园运送粮食，共度时艰……

在此度过了年时间的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家谈家桢，后来回忆说：“我一生在湄潭学院上有一些重要代表性论文，就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豪的是，在日后的科学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的。我们吃了湄潭米、喝了湄潭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生难忘。”

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浙大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与当地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学科研成果，还有力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遵义，诞生了《遵义鲜矿》《播州扬保考》等重要科研论文；在湄潭，仅以“湄潭”二字为题的论文就有25篇，内容涵盖当地农业经济的多个领域，如《湄潭之大气电位》《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之农业》等。此外，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刘迺芝与浙大师生一起对湄潭茶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从机州请来制茶师傅，按照龙井茶制作工艺研制出别有风格的“湄红”“湄江翠片”等品种，为后来湄潭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湄潭的7年间，浙大不仅坚持办学育人，还为当地留下了黔北地区最早的实用职业学校、现代茶叶科研体系，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据1946年有关统计，浙大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其规模由抗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扩展为6个学院25个系；学生人数也由抗战前的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浙大与湄潭的情谊并未随战火平息而消散。1981至1989年间，曾在湄潭浙大农学院任教的著名五倍子专家唐觉3次返湄潭考察，为湄潭县五倍子基地的发展奠定研究基础；自2008年起，浙大在湄潭设立支教点，年复一年播撒知识火种；两地持续深化合作项目……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深厚。

抗战胜利，浙大师生合影。源自图书《永远的大学精神 浙大西迁办学纪实》

抗战期间，浙大师生在湄潭的“国立浙江大学湄潭图书馆”前留影。摄于1940年。（浙江大学在遵义档案综述）